

日藏宋元禪僧

墨迹選編

江靜・編著

一切雲無雲即作雲無作
雲無作法即見佛若見相
時即一切雲見鬼取相故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日藏宋元禪僧

墨迹選編

江靜・編著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日藏宋元禪僧墨迹選編 / 江靜編著. — 重慶 :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4.5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ISBN 978-7-5621-6793-8

I. ①日… II. ①江… III. ①禪宗—僧侶—手稿—中國—宋元時期 IV. ①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4) 第 149131 號

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日藏宋元禪僧墨迹選編

江靜 編著

責任編輯: 杜艷茹 徐林平

責任校對: 段子君

裝幀設計: 丁 煜

出版發行: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地址 重慶市北碚區天生路 2 號 郵政編碼 400715

<http://www.xscbs.com>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地址 北京市朝陽門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刷: 香河華林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張: 25.75

字 數: 17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621-6793-8

定 價: 388.00 元

ISBN 978-7-5621-6793-8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持編纂
《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所列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0YJC870013）研究成果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副主任：陳祖武 黃蓉生

秘書長：黃書元 周安平 古 風

顧 問：白化文 安平秋 李致忠 何茲全 林甘泉 袁行霈

陳高華 馮其庸 傅璇琮 楊耐思 樓宇烈 魏同賢

饒宗頤（港）（按姓氏筆劃排列）

編委：

卜憲群	王子今	王秋桂〔台〕	王 勇	王家興
王啓發	王寶平	牛軍凱	尹在碩〔韓〕	古 風
白永瑞〔韓〕	白撞雨	任 超	江金輝	江 靜
李 民	李定凱	李遠毅	李富華	李 憑〔澳〕
吳樹平	呂宗力〔港〕	宋賢遠〔朝〕	沈乃文	沈 津
沈衛榮	范邦瑾	金慶浩〔韓〕	周心慧	周欣平〔美〕
周 斌	周興俊	波波娃・伊麗娜・費德羅夫娜〔俄〕		
居 蜜〔美〕	南權熙〔韓〕	段志洪	姚伯岳	真柳誠〔日〕
夏 露	馬泰來〔美〕	徐維凡	翁連溪	高 柏〔荷〕
宮城保〔日〕	孫 薇	孫家洲	孫欽善	陸 康〔法〕
陳士強	陳益源〔台〕	陳慶浩〔法〕	張玉範	張西平
張志清	黃仁生	黃樸民	黃燕生	喻遂生
傅飛嵐〔法〕	楊成凱	楊恩芳	趙 凱	蔣 寅
鄭克孟〔越〕	鄭金生	樓 勁	黎小龍	潘少平
賴長揚	盧 偉	閻 征	嚴紹盪（按姓氏筆劃排列）	



漢籍之路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序言

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文化交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絲綢之路，傳播中國的物質文化；一條是漢籍之路，傳播中國的精神文化。

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外物質文化交流的道路，這是舉世公認的。絲綢之路（silkroad）的概念，是十九世紀後期由德國學者提出的。各國研究者接受了這一概念，並習慣用它來解釋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但是，現在看來，這一概念有一定的局限。首先，中外文化交流不僅僅是物質互換，還有精神的溝通。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是對東西方商貿交流的研究，對精神文化的關注稍顯薄弱。其次，中外交流不完全是中國與西方的交流，也包括與東方其他各國的交流。儘管到了今天，絲綢之路的概念經過開拓，形成沙漠絲路、草原絲路、海上絲路三個部分，可是仍然無法包容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諸國交流的內容。再次，中外文化交流與經濟商貿交流的綫路，也不完全相同，在歷史時間上也有較大的差異。所有這些，便是我們提出漢籍之路（bookroad）的原因。

漢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載體，漢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沿著漢籍傳播的軌迹，尋找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應該是當代學者和出版人的責任。這些年，有志於此的學者，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學者就提出用書籍之路的概念，來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但是仔細想來，書籍之路的提法不如漢籍之路明確，探究的範圍也不應該局限在兩國之間，應該把漢籍之路作為打開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鑰匙。

漢籍之路的概念發萌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工作。在海外漢籍的版本調查、珍稀文獻的收集整理過程中，我們逐漸認識



到漢籍文獻流傳海外的一些特點。一般來說，漢字文化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結晶，浸潤了東亞與東南亞文化圈。在古代，漢籍的傳播是主動的、發散性的；傳播的途徑點面結合。在近代，漢籍的傳播是被動的、綫性的，珍貴的文獻被不平等交易或戰爭掠奪到海外。毫無疑問，漢籍傳播的形式與道路，無法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重合，而這方面的工作又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內容。這樣，突破絲綢之路的傳統思路，構建研究中國文化傳播與交流新的理論模式，也就成為必然要求。絲綢之路是一條商貿的道路，漢籍之路是一條文化的道路。區別這兩條道路，對於釐清我們概念的誤會，拓展研究的視野，將會有一定的意義。當然，這還有待於學術界的研究，有待於學者們的認同，有待於我們更多的共識。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是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寫入《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綱要》之中。域外漢籍珍本是指國外圖書館、研究機構和個人收藏的、國內不見或少見的漢文古籍文獻，內容有三：其一指我國歷史上流失到海外的漢文著述；其二指域外翻刻、整理、注釋的漢文著作（如和刻本、高麗刻本、安南刻本等）；其三指原採用漢字的國家與地區學人用漢文撰寫的、與漢文化有關的著述。這些文獻內容豐富，涉及中國經學、史學、佛學、道學、民間宗教、通關檔案、傳記、文學、政制、雜記等各個方面，彌足珍貴，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資料，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核心資料，同時是研究歷史上東亞漢語言文化圈的基本資料，是中華文化的珍貴遺產。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了“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對“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性。當前，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政府與民間有多個斥重金回購流失文物的舉措，但是對佚散海外的漢文古籍的回購、複製、整理工作重視並不夠。域外漢籍珍本是中華文化的寶貴財富，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計劃出版一套影印古籍，共計八百本，囊括兩千餘種珍稀典籍，應該是當代中國最輝煌的出版工程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流失國外珍稀文獻的搜尋整理，不是一項簡單的文化活動，更主要的目的是通過這項活動，妥善保存中華文化遺產，豐富中華文化內涵，熔鑄中華文化精神，從而強化中華民族的尊嚴，提升國家的形象。同時，佚散在海外的漢籍文獻，由於各個國家重視程度的不同、保護手段的差異，文獻的品相也各有不同，因此，儘快地刊印無法再生的域外漢籍珍本，應該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出版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交往日益頻繁，與許許多多國家互結友好，以漢字為特質的中華文化也得到世界各國文化學術界的重視，整理域外漢籍不僅是國內學者的呼籲，也是國外學者的倡議。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我們經過反復論證，決定在學界鼎力襄助下，編纂出版《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以留下前人超越時空的智慧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典籍。

毋庸諱言，《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叢書的編纂，也將給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積累豐富的學術資料，給漢籍之路的理論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內涵，流失在海外的漢文古籍便是“漢籍之路”閃亮的標識。我國的出版工作者應該弘揚漢籍之路理論，推動漢籍收集出版工作，使中華文化的價值進一步得到世界的認同。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資料搜集與編纂已進行多年，版本調查、編目、複製、出版等各項工作進展有序。作為成果的《文庫》將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自今年始，本叢書將陸續與學者、讀者見面，特應編者與出版者之邀而為序，茲綴數語，以表心志。

戊子仲秋

柳詒徵



凡例

1、本書收錄一百六十八件被日本政府列為重要文化財（含國寶）的宋元禪僧墨迹，不包括各類畫贊。

2、全書墨迹根據作者生年排序，生年不詳者，據其活動時間及卒年插入適當的位置。同一作者的作品根據完成時間排序，完成時間不詳者放在最後。對於跨朝代的禪僧，根據該僧在各朝代活動時間的長短歸入相應的朝代，因此，元僧中也包括個別在明朝初年依然活躍的禪僧。

3、全書採用繁體字。除專名用字及特殊用法外，錄文中的異體字徑改為通用繁體字形，如“𡵓”改“時”、“槩”改“概”、“禪”改“祀”、“疎”改“疏”、“恠”改“怪”等。

4、對於常見易誤寫字，如“己、巳、已”、“戌、戊”、“旦、且”等，錄文時，據文意徑改，其它誤字及通假字以（ ）標之，左列正字；有奪文者，加[]補之；無法判斷者，以□代之；難以斷定而存疑者，以（？）疑之；衍字者，以（—）刪之；字迹不清據他文錄文者，加{ }修之。

5、凡原文初寫時有訛脫，後又改補者，徑錄改補之字。

6、對於首次出現的墨迹作者和墨迹主要相關人物，予以簡要介紹。生卒年某項不詳者，用問號表示，如：“（？—1365）”，“（1262—？）”；生卒年不詳，但根據墨迹內容可知其某個具體活動的時間時，在生卒年間注出活動時間，如：“（？—1268—？）”；生卒年不詳而無考者，則付諸闕如，一律不出“生卒年不詳”字樣。所有人物生卒年僅在首次出現時標注。

7、作者簡介與解題中的年號根據所涉事項發生國紀年法標注。若



所涉事項發生在中國，採用中國年號；發生在日本，則用日本年號；除却不明者，一般不在年號前注明“宋”、“元”或“日本”。日本南北朝時代（1333—1392）的年號採用北朝年號，依據為文中涉及主要寺院皆在北朝統治範圍之內。同一條目中出現的年號，僅在首次出現時標注公元紀年。

8、對於作者簡介與解題中出現的歷史地名，標注治所今所在地；寺院標注今所在地，不清者不注。標注僅限于文中首次出現時。

9、正文及附錄《日藏宋元禪僧墨迹（國寶・重要文化財）目錄》中的墨迹收藏機構，僅在首次出現時標注所在地。

10、墨迹尺寸依據每日新聞社圖書編集部編《國寶・重要文化財大全 8 書迹 下卷》（每日新聞社，1999年）。被指定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的時間及收藏者信息依據日本文化廳官方網站“國指定文化財等データベース <http://kunishitei.bunka.go.jp/bsys>”。





序言：日藏宋元禪僧 墨迹的基本情況

一、墨迹的概念

“墨迹”一詞，《漢語大詞典》作如下解釋：“亦作‘墨蹟’‘墨跡’。①墨色的痕迹；用墨鉤勒的線條。例如，宋沈括《夢溪筆談·書畫》：‘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其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中略）②書、畫的真迹；某人親手寫的字或畫的畫。《南史·范曄傳》：‘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唐張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之二：‘學書求墨跡，釀酒愛朝和。’（後略）”¹

宋元時期，以“墨迹”稱呼某人書法作品的情況極為普遍。筆者曾以瀚堂典藏數據庫收錄的121種宋元史料筆記為對象，檢索了其中“墨迹”一詞的用例，相關記錄數為98條，其中，基本都是指書法作品。例如，北宋初年黃休復《茅亭客話》卷三：“僞翰林待詔米道鄰侍書於太子，掌書法百餘卷，皆是二王法帖、古來名賢墨迹，及石本者。”²北宋末年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十：“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內出古畫墨迹百一十四軸，藏之閣上。”³此外，禪僧語錄中也有頗多這樣的用例，例如，南宋《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下《為承天真藏主跋諸老墨迹》：“先輩愈遠，聲迹愈新，或得其片言隻字，一展玩時，面目見在，此無他，道德行解所致然也。真藏主近獲諸老墨迹，凡十數家字，意各不同，同宣此義。”⁴元《元叟行端禪師語錄》卷八收錄有《題張義祖墨迹》《題癡絕墨迹》《跋宏智石窗自得張漢卿諸老墨迹》《跋大慧墨迹》《跋癡絕贊迦文項羽二墨迹》《跋大慧癡絕天目偃谿晦巖斷橋象潭叔凱諸老墨迹》《跋偃谿墨迹》《跋



瞎堂和尚墨迹》等八篇題跋，皆是為僧俗書法而作，例如，其中稱贊張義祖墨迹：“其引筆行墨，有晉諸王凝操氣骨。”⁵

當時，除了以“墨迹”稱呼某人的字，還有“書迹”“真迹”“手澤”“手帖”“筆迹”“手書”等多種說法，例如，《南史·蕭子雲傳》：“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⁶元《了庵清欲禪師語錄》卷九《題跋》除了《大慧和尚墨迹》《佛照禪師墨迹》《塗毒禪師墨迹》《佛燈珣和尚墨迹》《密庵和尚墨迹》，另有《五尊宿真迹》《別峰塗毒二禪師手澤》《長靈卓和尚手帖》《無準和尚筆迹》《此庵師祖手帖》《溫日觀手書大慧禪師過移忠小詞》等。

據日本學者今枝愛真研究，日本“墨迹”一詞最早出現在《普門院藏書目錄》中。淳祐元年（1241），日僧圓爾從宋朝帶回典籍數千卷，這些書都納入了京都東福寺普門院的書庫，圓爾為此編寫了《三教典籍目錄》，惜此書已佚。後東福寺住持大道一以（1292—1370）重新編寫了《普門院藏書目錄》，該目錄按《千字文》排序，其中，“珠”字部下記載“古人墨迹等”。此外，完成于貞治二年（1363）的鎌倉圓覺寺佛日庵財產目錄《佛日庵公物目錄》中，亦專門設有“墨迹”類，其中，“唐分”（中國部分）下記載着宋代禪僧“密庵咸傑、虛堂智愚等人”，“日本分”（日本部分）下記載着赴日後終老日本的元代禪僧“一山一寧”，可見，“墨迹”一詞在日本最初是指傳入日本的中國高僧的書法作品。後來，該詞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例如，義堂周信（1325—1388）在其日記《空華日用工夫略集》永和元年（1375）十月二十日條中有如下記載：“平生一衣一盞以外，不畜長物，所藏第故交先輩墨迹而已。”⁷此處的墨迹，即包括日本禪僧的作品。現在，“墨迹”在日本基本是指禪僧的書法作品。⁸

本書所謂的宋元禪僧墨迹，即指宋元禪僧留下的墨寶，但是，不包括書稿。



二、墨迹的作者

墨迹的作者可分為赴日傳法僧和未赴日傳法僧兩類。

（一）赴日傳法僧

宋元之際，有不少中國禪僧東渡扶桑，他們殫精竭慮弘揚禪法，為禪宗扎根日本、走向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目前已知的赴日僧共有26名，包括宋僧11名、元僧15名。除1人情況不明，2人為曹洞宗僧，其餘皆為臨濟宗楊岐派下虎丘派僧，無一人屬南宋時期頗為繁榮的楊岐派下大慧派系統。對此，玉村竹二的解釋是，在與受到官府支持的大慧派的抗爭中，虎丘派居于下風，只能向外尋求發展，大慧派則無此必要。⁹西尾賢隆認為此種解釋并不合理，因為宋元時期的中國禪林並無明顯的門派對立現象。¹⁰筆者贊同西尾的意見，但對赴日臨濟宗僧皆來自虎丘派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尚無研究。

現存墨迹中，據傳為赴日僧留下的作品至少有190件（詳見附錄二），其中，留存墨迹數在8件以上的僧人依赴日時間先後依次是：蘭溪道隆（32件）、兀庵普寧（21件）、大休正念（10件）、無學祖元（22件）、一山一寧（38件）、清拙正澄（28件）、明極楚俊（14件）、竺仙梵僊（14件）。這8人皆德高望重，且長期擔任日本五山寺院的開山或住持，在日本開創了自己的宗派，弟子眾多，與日本當權者關係密切，受到公武兩家的崇信。

（二）未赴日傳法僧

在日本，還有458件墨迹據傳為未曾赴日的宋元禪僧的作品。除去身份不詳的禪僧留下的23件墨迹，另外435件墨迹作者的所屬宗派及留存墨迹數如下表所示：



	臨濟宗楊岐派						曹 洞 宗	雲 門 宗	合 計
	大 慧 派	虎丘派				其他			
		松源系	破庵系	曹源系	其他				
作者數	33	39	32	6	1	1	1	1	114
墨迹數	116	156.8	129.5	23.8	1	4	2.8	1	435

注：同一件墨迹若有兩或三位作者，每位作者計0.5或0.3件。

從上表可知，日藏宋元禪僧墨迹基本為臨濟宗楊岐派僧的墨寶，這一方面與大慧派、虎丘派在宋元時期的地位與影響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因這兩派與日本禪宗界的關係比較密切。

進入南宋以後，曾經輝煌的雲門宗和臨濟宗黃龍派在南方地區皆走向衰落，沒有出現有影響的禪師。代之而起的臨濟宗楊岐派，“以臨濟宗的正宗和唯一代表自命，成為禪宗中的最大派系”¹¹。元朝，在統治者崇奉藏傳佛教和尊教抑禪的歷史背景之下，北方禪宗逐漸沒落，南方禪宗却依然保持活力，而南方禪宗均屬臨濟宗，有影響的禪師大多出自楊岐派大慧宗杲（1089—1163）和虎丘紹隆（1077？—1136）門下。

說到與日本的關係，以虎丘派下的松源系和破庵系最為密切。以下兩個統計結果或許能說明這一點：（1）目前已知的赴日26名禪僧中，有22名來自松源系和破庵系；（2）宋元時期從中國傳到日本的24個禪宗門派中，松源系下屬派別有8個，破庵系下屬派別有9個，占三分之二強。

與虎丘派不同，大慧派未有僧人赴日傳法，大慧派中傳到日本的禪宗流派也僅有元代來華求法的日僧中巖圓月開創的“中巖派”一種，因此，其在日本的影響力不及虎丘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來華求學的日本僧人中，有許多都曾在此派高僧門下參禪問道，特別是



從元代晚期到明代初期，大慧派日本參徒陡然增多，已知者即達到88人，因此，大慧派與日本的關係也不容忽視。

南宋時期影響僅次于臨濟宗的曹洞宗，僅有雲外雲岫（1242—1324）一人的墨迹被保存下來。筆者以為原因有兩點：（1）由于日本曹洞宗的創立者道元（1200—1253）不與權勢接近，提倡深山修行，同時，赴日傳法的中國僧人也基本來自臨濟宗，曹洞宗在日本上層社會的影響較弱，來華的曹洞宗僧數量較少；（2）在南宋、元前期五山禪刹的98任住持中，曹洞宗僧僅有5任，其餘皆為臨濟宗僧¹²，而來華日僧參訪修行的主要寺院就是五山禪寺，因此，曹洞宗僧與日僧接觸的機會不多，他們的墨迹因而也較少被傳到日本。而雲外雲岫的墨迹得以東傳的原因當在以下兩點：（1）其嗣法弟子東陵永瑛（1285—1365）于至正十一年（1351）東渡扶桑，在日15年，歷住天龍、南禪、建長、圓覺等諸大禪寺，法化甚盛；（2）雲外雲岫曾擔任天童寺住持，巧善說法，朝、日慕名來訪者衆多。

目前留存墨迹數在5件以上的僧人有大慧派的大慧宗杲（9件）、北磻居簡（5件）、物初大觀（6件）、偃溪廣聞（9件）、楚石梵琦（30件）、石室祖瑛（6件）；松源系的虛堂智愚（21件）、石溪心月（9件）、靈石如芝（11件）、古林清茂（13件）、月江正印（31件）、了庵清欲（15件）、獨孤淳朋（5件）、即休契了（5件）、見心來復（5件）；破庵系的無準師範（40件）、竺田悟心（8件）、中峰明本（30件）、平石如砥（9件）；曹源系的癡絕道沖（15件）等。

上述僧人具有以下特點：

1. 所有僧人皆屬臨濟宗大慧派和虎丘派系統。

2. 除大慧宗杲，諸僧會下皆有日僧參謁，也就是說，這些墨迹的作者也是來華日僧參謁求學的對象。大慧宗杲門下之所以沒有日僧，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尚無日僧為學禪來華。最早對禪宗產生興趣的日僧是比叡山延曆寺的覺阿，他于宗杲辭世後的乾道七年（1171）來宋，嗣法靈隱寺佛海慧遠後回國。我們還發現，元僧會下的日僧數要